

自由的理由，存在的理由

——玛德莱娜·戈贝尔女士专访

黄 荭

黄荭：很高兴又在南京见面了。记得两年前您来中国是为了纪念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尔·萨特的百年诞辰。当时你在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法国文化中心和几个城市的法语联盟做了系列讲座并播映了一部非常珍贵的电影资料片《萨特-波伏瓦双人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年来您陪伴波伏瓦和萨特走遍了世界。

戈贝尔：的确如此。从2005年纪念萨特百年诞辰开始，我携片在全球巡回放映和演讲，至今已经去了世界各地70多个城市。第一站是威尼斯，紧接着是里斯本，然后到了我的故乡在加拿大九个城市巡回讲座，之后是六个巴西城市、四个日本城市、十个法国城市、四个瑞士城市、三个突尼斯城市、六个中国城市，还有美国、德国、爱尔兰、波兰、格鲁吉亚、越南……

黄荭：作为这对“惊世骇俗”的传奇情侣的生前好友，您这几年参加了许多纪念活动，比较2005萨特百年诞辰和2008波伏瓦百年诞辰，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戈贝尔：围绕两个百年诞辰世界各地都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巡回讲演、手稿展、电影资料回顾展。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波伏瓦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似乎远比2005年萨特百年诞辰热闹。2005年我们回顾萨特，仿佛是在对存在主义大师的思想、创作和政治介入活动做一个清算，仿佛在为萨特神话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画一个句号。但2008年我们谈论波伏瓦，不是要对她做总结，而是要（重新）发现被萨特光芒遮蔽、被女权主义外衣掩盖的哲学家波伏瓦、文学家波伏瓦、社会活动家波伏瓦……2008年，在巴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纽约、柏林、海德堡、埃森、科隆、图宾根、威尼斯、佛罗伦萨、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魁北克等地的学府和文化中心都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1月9—11日，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巴黎组织了参加者多达三百人之众的波伏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波伏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盛会。会议的论文集已经出版，名为《（重新）发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作品：从〈第二性〉到〈告别的仪式〉》。

黄荭：我们都强烈地感到波伏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她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和出版的热点。在中国也是如此，2008年7月14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会组织举办过一场“纪念西蒙娜·德·波伏瓦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8年11月10—12日，南京大学法语系、上海译文出版社、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联合主办了“波伏瓦及其当代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译文出版社继昆德拉、杜拉斯之后把波伏瓦作为了他们的经典系列的重要选题，2009年将首批推出波伏瓦的七部著作：《名士风流》、《女宾》、《模糊性的道德》、《告别的仪式》、《独白》、《要焚毁萨特吗？》和首个直接从法文译过来的《第二性》的全译本。

戈贝尔：今年法国伽利马出版社还推出了一系列波伏瓦作品的袖珍本。

黄荭：我也注意到了，其中再版的有《长征——中国随笔》（1957）。1955年，萨特-波伏瓦受到官方邀请来中国访问，他们在中国参观旅行了六星期，回国后波伏瓦写了《长征》一书。分为《北京的发展》、《农民》、《家庭》、《工业》、《文化》、《自

卫斗争》、《十月一日》、《中国的城市》八个章节，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新中国的社会现实。

戈贝尔：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官方访问意味着什么，而且还有语言交流的障碍，所有的信息都得经过双重过滤（一重是政治，一重是翻译），所有的参观访问都是事先一丝不苟排练好的，他们看到的只是官方希望他们看到的新中国。但凭着女性和知识分子的敏锐，波伏瓦还是猜到了或者说是预见到了某些真相。

黄荭：这或许也是今天我们重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曾经失落的（被遮蔽或被粉饰的）历史现实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产生作用？

戈贝尔：作家见证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萨特、波伏瓦这样自觉的、介入的作家。萨特和波伏瓦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祝福。他们去过古巴、多次访问苏联，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很有研究，萨特曾经说自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他更关注的是争取人权和民权、反对压迫和殖民的斗争。

黄荭：再回到波伏瓦的写作上，她的作品很多，有小说、有回忆录、有戏剧……但最著名的还是1949年发表的被誉女权圣经的《第二性》，全世界关于波伏瓦的研究文献几乎有一半是围绕着这本书展开的，在英美国家尤其如此。

戈贝尔：这和70年代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是密不可分的。《第二性》势必成了女权研究和性别研究的一个绕不过去的经典文本。对了，2009年《第二性》出版60周年之际，新的英文版《第二性》也将问世。此外，仅2008这一年，就至少有六本波伏瓦传记出版。我的好朋友达妮埃尔·萨乐娜芙创作的《战斗的海狸》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本，作者达妮埃尔·萨乐娜芙是法国著名作家，曾多次获重要的文学奖项，如勒诺多奖、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玛格丽特·杜拉斯戏剧奖，她本人还是费米娜奖的评委。

黄荭：《战斗的海狸》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中文里倒是有个词可以比较合适地去界定它：“评传”。在书中，萨乐娜芙试图从波伏瓦自身的多个文本出发去重新描绘海狸之所以成为海狸的路径，波伏瓦选择了写作，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波伏瓦的养女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说“波伏瓦不是因为选择了萨特而成为波伏瓦，波伏瓦是因为成为了波伏瓦而选择了萨特”）。这本书中国已经买下版权，我和两个研究生在译，09年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戈贝尔：这让我想起另一本08年在法国出版的很重要的书——波伏瓦的《青春手记》（1926-1930），它从内部见证了西蒙娜成长蜕变为波伏瓦的历程，她曾经有过的矛盾和挣扎，但她终究（和萨特一起）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黄荭：这本书和她的几卷本回忆录不同，她的回忆录给人的、或者说她竭力营造的是一个前后一致、意志至上的形象。但《青春手记》则多了一份真实的青涩，多了一份在对自我的追寻中所产生的焦虑和犹疑，甚至是对自我的一种质疑和拷问，有时充满了悖论。

戈贝尔：这也是她特别打动我的一面，因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

黄荭：您是怎么结识波伏瓦并成为她的忘年交的？

戈贝尔：说来话长。我出生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父母都是法国移民，那时候我的家乡还非常保守闭塞，尤其是在加拿大的法语区，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虔信宗教的传统家庭。比如母亲早上把我们叫醒后一定要说“感谢上帝！”而我们也必须回答“感谢上帝！”在茫茫雪原的寂静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中，我开始阅读波伏瓦的作品，当时还很小，十三四岁的样子。从小我就对“自由”情有独衷

也找到了属于我的“自由之路”——文学和阅读。书籍让我们升华，变得崇高。我当时就很清醒地意识到惟一可以拯救我的就是赋予我力量和想象的阅读。我的朋友达妮埃尔说过：“没有书籍，所有的人生都是平庸的人生。”对阅读的热爱成了我和波伏瓦日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的共同秘密。

黄荭：据说十五岁那年，您给她写了信……

戈贝尔：是的。当时我读萨特的书，《恶心》、《墙》、《关于犹太问题的思考》，也读波伏瓦的书，《女宾》、《人都是要死的》、《第二性》。《第二性》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年龄的差别，什么是女孩，什么是女人，母亲，祖母。很吸引人的书对我而言不啻为一种“启示”，可能当时很多年轻姑娘和已婚妇女在阅读此书的时候都有同感，“我找到一个朋友了，我不再孤独了。”我给出版波伏瓦作品的伽利马出版社写了信，这就好像朝汪洋大海里扔了一个装了求救信的玻璃瓶她给我回了信，我“得救”了！

黄荭：寄信的时候您想过她会给你回信吗？

戈贝尔：我当时坚信她会给我回信，虽然我小小年纪，但我从小就认定自己是个“人物”：认定一个迷失在加拿大雪原里、渴望自由的小姑娘，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形象一定会打动海狸！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黄荭：于是巴黎，尤其是萨特、波伏瓦经常出入的圣日尔曼德普雷就成了您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戈贝尔：“巴黎神话”对我们这批五十年代生活在加拿大冰天雪地和精神荒漠里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抵挡不住的诱惑。巴黎战后急于忘记苦难、急于寻欢作乐的青年男女，他们出入巴黎圣日尔曼德普雷的酒吧间、歌舞厅，他们听爵士乐，听鲍里斯·维昂的萨克斯风，听朱丽叶·格蕾科的情歌，同时他们也读萨特。他们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揣着一本《存在和虚无》在大街上晃荡。我当时常常从图书馆里借书看，手里捧着《存在与虚无》、《恶心》、《名士风流》、《人都是要死的》……还有纪德、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天天梦想着走出这片雪原，去法国、去巴黎，去波伏瓦常去的“双叟”“花神”咖啡馆喝茶。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德·尚达尔先生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说我读萨特的书，读波伏瓦的书，还有纪德的书，这些书当时都是被宗教裁判所判定“伤风败俗”的禁书。他跟我母亲说照此以往，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大学的学业。那天傍晚我回到家，母亲一把夺过我捧在手上的书，一股脑全扔到壁炉里烧了。我弟弟妹妹都吓哭了，我懵了，同时也很气愤。我父亲是个明智、儒雅的人，这天晚上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聪明人可以暗地里做很多事情，你应该学聪明点，那些书你可以在运河边、在图书馆里看，没必要招摇过市地把它们带回家，带到你母亲眼皮底下来。”这就是聪明的父亲给女儿的聪明建议，有点像莫里哀戏剧《伪君子》里的达尔丢夫，当他勾引欧米尔的时候说：“私下里不声不响地犯罪不叫犯罪，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

黄荭：变聪明的您于是一直偷偷读禁书，一直保持和波伏瓦的通信，直到18岁那年，您终于到了法国，第一次见到了波伏瓦。

戈贝尔：那是1958年5月，国际博览会在布鲁塞尔开幕，我被选中去当向导。第一个周末我就坐上火车去了巴黎。我敲响她家的门铃，她亲自开的门，我说：“我来了！”她大笑，我觉得她很美，五十岁，很经典的轮廓，梳着发髻，纹丝不乱，有点东方的温婉。随后是我和她一生矢志不渝的友谊。建立在书本、阅读上的友谊。我们都是“大书虫”（用法语说是“图书馆的老鼠”），常常互相给对方推荐书看，有点像玩读书竞赛的游戏，看谁读得快，读完就一起交流心得、

点评作品。

黄荭：那萨特呢？他给您的印象是……

戈贝尔：萨特个子矮小，厚嘴唇，斜眼，是挺丑的，但只要一听他说话，你对他的印象就会彻底改变，他变得迷人、睿智、敏锐而且幽默，属于那种有很多思想闪光的人，你会不自觉受到他的吸引，而且他很慷慨，而且虽然朝三暮四，却从不始乱终弃，当爱情不再了，他和情人们都保持着往来，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在经济上“养”着她们。他之所以写戏剧，很大原因就是为了让他的情人有角色演。萨特和波伏瓦都属于健谈爱交流的人，或许跟他们都曾经做过老师有关，说起来就是滔滔不绝，思维非常活跃，所以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必须跟上他们思想的节奏，否则你就会落后，就只能乖乖地做“学生”。

黄荭：我知道您在60年代为加拿大广播电台做了很多法国名人专访，像萨特、波伏瓦，还有他们的朋友让·热内、娜塔莉·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吉罗、西蒙娜·韦伊、米歇尔·莱里斯……您也为很多媒体如《多伦多之星》、《新观察家》、《潮流》、《花花公子》、《巴黎评论》等写过大量的报道。这和他们对您的影响和帮助是不是都有密切的关系？

戈贝尔：是的，波伏瓦和萨特都有很多优点，善良、忠诚、慷慨，他们介绍了很多朋友给我认识。当时作家们的生活更加“圈子化”，所以走进了萨特一波伏瓦的圈子，就意味着走进了以“花神”、“双偶”咖啡馆为中心的“圣日尔曼德普雷的文人圈”。当时我的身边围满了法国作家，尤其是《现代》杂志的一批作者和编辑。而且大家都喜欢去咖啡馆，而且都去那么相同的几家，而且几乎都吸烟，吸得很厉害，有时候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另类，我也会叼根香烟，但我从来都不真正吸进去。

那帮作家中，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让·热内，《小偷日记》的作者，他说在他身上最能体现萨特关于“自由选择”的哲学命题。自由是一个辩证的选择，一个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也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从小偷让·热内到诗人让·热内到戏剧家让·热内，这其中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是个人在某个时候作出的选择把偶然变成了必然。让·热内每次拿到稿费就会一分为二，放在裤子的两个兜里，萨特有次好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一般小偷在一个口袋里掏到钱就不会再去打另一个口袋的主意了。”他打趣说那是他过去的职业经验。

黄荭：但您并没有就此在巴黎安顿下来，享受波伏瓦和萨特为您铺垫好的生活。

戈贝尔：我从小就是个要强的人，我也有我的自由选择。记得有一天，波伏瓦对我说：“萨特觉得您在巴黎要比在渥太华更幸福，萨特近来的戏剧很挣钱，我们可以资助您在巴黎生活几年。”我大叫：“不，海狸（我这样称呼她，和萨特一样），我不能！我可是读《第二性》长大的！”自由的前提是能够经济独立，女人首先应该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尽管我很喜欢法国，尽管每次不得不离开巴黎的时候我都很难过！我还是选择回加拿大继续深造，做了博士论文，成了卡尔顿大学的一名年轻老师。六十年代，我一边教书，一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波伏瓦、萨特常常介绍身边的朋友跟我做访谈，我挣的钱足够我每个夏天飞去巴黎小住，回到他们身边），同时我也有幸在电台和电视上谈论文学，因为我伟大的祖国当时正处在一个人们所谓的“平静革命”的年代，正在向世界开放。

黄荭：他们介绍身边的朋友给您采访，他们自己是不是也接受您的采访呢？

戈贝尔：1964年我有幸两次长时间地采访萨特和波伏瓦。第一次是谈波伏瓦，谈她作为女人和作为作家。第二次谈了几个小时，关于萨特的生活、写作和思想。

那些访谈文章给我换了不少钱。

黄荭：您当时的生活非常充实，作为年轻的职业女性，工作占据了您生活的中心，是这样吗？

戈贝尔：是的，时代变了。我祖母生了23个孩子，我母亲9个，而我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到50岁才找到我的真爱，要生孩子已为时太晚。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避孕、性自由、妇女解放，我们选择了工作。我热爱工作，一直没完没了地工作，大学、广播、电视台，还有巴黎、旅行……

黄荭：就在这一时期，您产生了给萨特、波伏瓦拍摄影片的念头，他们是不是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呢？

戈贝尔：他们说只要这些影片能让我挣到足够来巴黎的钱，那他们就乐意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的拍摄。于是，1967年，我拍摄了三部关于他们的影片，每部都是一小时，一部是《双人像》，一部是《萨特专访》，一部是《波伏瓦专访》。因为我当时还很年轻，他们请了资深记者克洛德·朗兹曼来协助我一道采访，朗兹曼是波伏瓦的最后一个情人（当时他42岁，波伏瓦59岁，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结束，但偶尔在影片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两个温情脉脉的眼神交流）。

波伏瓦爱看电影，朗兹曼也很喜欢，他们爱情的故事就是从朗兹曼打电话约波伏瓦一起去看电影开始的，波伏瓦握着电话就激动得哭了。那是1952年，波伏瓦刚刚结束了她的那段刻骨铭心的越洋之恋，或者说是尼尔森·艾格林下了分手的最后通牒，波伏瓦万念俱灰，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恋爱了。当时是波伏瓦是《现代》杂志声名显赫的女老板，而27岁的朗兹曼是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年轻记者。朗兹曼是犹太人，也是后来长达9小时的揭露纳粹集中营的影片《浩劫》（*Shoah*, 1985）的导演。波伏瓦非常热爱旅行，还有远足，年轻的时候她属于“背包族”，后来她和萨特做了很多官方旅行，中国、苏联、古巴、日本……还有很多私人旅行，和萨特，和情人，和她（旧日）的女学生。

黄荭：三重奏、四重奏、还有蓝调芝加哥，这些复杂的“偶然之爱”和“必然之爱”之间的纠葛和缠绵在波伏瓦的小说（《女客》、《名士风流》）、回忆录（《时势的力量》、《年华的力量》），萨特的三部曲《自由之路》，还有他们之间的通信和他们和友人之间的通信中都有很多影射以及露骨不露骨的描写。可以说，他们自由的情侣关系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也因此惹出了不少口水仗。

戈贝尔：他们选择了他们的自由，同时也冒着这一自由的危险，就像克里斯蒂娃所说，因为自由永远是自我和他者之间一种脆弱的平衡，一道模糊的界线，难的是在越界的同时懂得去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黄荭：他们属于生活和作品几乎没有距离的那一类作家，所以普通读者对他们自身传奇经历的好奇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对他们作品本身的关注。记得2006年您携片来中国巡回演讲，也来过我们学校，当时放映的就是《双人像》，我们很兴奋，因为在片中第一次看到《现代》杂志的编辑部，看到萨特弹钢琴，看到萨特的母亲、养女，看到这对文字情侣肩并肩坐在书桌前写作，烟抽得很凶。

戈贝尔：这是影片中我最喜欢也最让我感动的画面，现在有些“波伏瓦迷”和“萨特迷”势不两立，力图彻底否定两人在创作中的交流和合作关系，这是非常可笑也是非常可悲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电影是在1967年拍摄的，就是在五月风暴的前一年，处在一切都在分崩离析的前夕，那是新浪潮的年代我们肩上扛着摄像机可以在巴黎满大街拍摄，在饭店，在花神咖啡馆，在报摊在萨特母亲家里……

黄荭：我记得你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波伏瓦指给您看她和萨特以前爱坐的位

置。

戈贝尔：是的，她说是带我去怀旧，当时我经常陪着她怀旧，因为我们常常一起泡咖啡馆。二战期间他们常去那里，因为暖和，波伏瓦喜欢坐在离火炉很近的软垫长凳上，而萨特通常坐在挨着酒瓶子的桌子旁边。

黄荭：她还带您去看萨特曾经住过的房子，看她和妹妹“玩具娃娃”出生的房子。

戈贝尔：尤其是看三楼的阳台，在《闺中淑女》里，波伏瓦写道：“我就坐在阳台上，我就坐在那里看大街上往来的行人。”那是她童年的乐趣，想象大街上这些人可能会有的故事。她还带我看她曾经上过的中学，看《词语》一书中故事发生的房子，它不是萨特出生的房子，而是萨特五岁时寡居的母亲带他住回娘家，一直到她再婚搬到拉罗歇尔去住之前的房子。是他童年时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那里萨特沉浸在阅读中，萌生了“写作的梦想”。

黄荭：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之所以牢不可摧，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之间从不间断的思想上的对话，除了多年的亲情，他们还有非常深厚的工作关系。

戈贝尔：萨特和波伏瓦通常中午会约在“调色板”餐厅吃饭、聊天。就算他们没在一起午餐，那他们也会恪守他们下午四点的约会，约好一起肩并肩地创作。他们可以有六个月时间都不知道对方具体在写什么，但他们的手稿都会第一时间交给对方“审批”。比如萨特是那本让波伏瓦蜚声全球的《第二性》的第一位读者，也是他建议波伏瓦在作品中更多地谈论自己，从女性的角度去思考存在的种种境域。而波伏瓦总会对其作品提出尖锐的意见，有时候萨特会很生气，但平静下来他发现波伏瓦的意见“永远正确”。萨特一波伏瓦这对传奇情侣的爱情更多的是维系在他们的思想交流的“绝对透明”上，对待写作如此，对待政治介入如此，对待两人各自“偶然的爱情”亦如此。

黄荭：我记得在片中您问了萨特很多问题，比如他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他对越南战争、殖民主义的态度，还有罗素法庭……当时萨特的想法很犀利思路很常敏捷，表达也很清晰，我们甚至认为他对发动越南战争的美国的批判可以折射出伊拉克战争的某些本质问题，这跟七十年代一些记录访谈片中萨特衰老、疲惫、犹疑、虚弱的形象反差很大。

戈贝尔：1967年我拍摄的是黑白片，当时萨特的身体状况还好。几年后其他人拍摄的都是彩色片，那时萨特左半脑的循环系统功能已经严重失调，有一部分血管很狭窄。萨特本来就丑，现在更丑了，话说不清楚，嘴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的症状。他每天抽三包香烟，为了保持思维的活跃，他长期以来白天服用安非他命让大脑兴奋，晚上喝大量威士忌来放松。最终他的健康全毁了，他产生了幻觉神智有些不清，逻辑也开始变得混乱，很难捕捉他的思想，尤其是1973年失明以后。但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双目失明的萨特，羸弱、守着病痛折磨，但他从不抱怨，他常常微笑着，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他晚年的时候，萨冈时不时会去看他，约他在餐厅吃饭，偷偷塞给他一小瓶烈酒，因为海狸已经严格限制他饮酒了。

黄荭：有人说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骄傲，因为这个奖先颁给了另一个存在主义大师加缪而不是他，您是怎么看的？

戈贝尔：拒绝诺贝尔的一大笔奖金首先需要的是勇气，不受金钱诱惑或者收买的勇气。我记得当时我对萨特说赶快去领奖吧，那可是一大笔钱呐！女人总是实际的。但他拒绝了，我不认为那是出于傲慢，我相信他的理由，作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理由。他拒绝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他不愿意

妥协，他永远都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一些法国民众骂他是叛徒，他的房子遭到了塑料炸弹的袭击，还好没有人员伤亡。马尔罗的房子也被炸了，很严重，二楼的一个小姑娘被炸瞎了一只眼睛。

黄荭：在塑料炸弹事件后，他们有一阵子就住在萨特的秘书克洛德·弗帮他们找的公寓里，这是这对“假太太”和“假先生”（“弗”在法语中“假”是一个发音）难得早晚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光。

戈贝尔：是的，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萨特都一直和他母亲一道住，后来还有他的养女。

黄荭：除了《双人像》，您和朗兹曼还对萨特和波伏瓦分别做了一小时的专访，您这次来华是不是要给中国观众播映“波伏瓦专访”呢？

戈贝尔：是的，这次我要在南京、上海、西安、北京的多所大学和法语联盟、文化中心播映。观看这部影片时我要特别提醒观众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部资料片是四十一年前拍摄的，当时世界上都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呢？那是冷战时期。1967年也是越战时期，波伏瓦和萨特都参加了罗素法庭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所犯下罪行的控诉。当时，让波伏瓦大受震动并曾激起她强烈抗议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结束。这也是引起法国社会无数变革、动荡的1968五月风暴的前一年。但法国妇女解放运动还不明显，要等到几年后才在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下蓬勃发展起来。

黄荭：波伏瓦对当时法国及其世界各地的女性的处境怎么看？

戈贝尔：当时女性的处境跟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1949年波伏瓦发表了《第二性》，被誉为“女权圣经”而广为流传，但她的书并没有产生她所期望的巨大影响。1967年她的印象是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波伏瓦认为妇女境域只有女权解放更多应该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而获得，一种彻底的社会变革，把人从旧的体制中解放出来，顺便把女性也从不平等的存在中解救出来。

黄荭：但70年代美国轰轰烈烈女权运动让她的观念有了转变，这种自觉的女权斗争让她逐渐意识到所有的解放都应该从内部到外部的，第二性的解放不能坐等第一性的觉悟和恩赐，只能自己去斗争取得。

戈贝尔：女性要求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包括怀孕和生育的自主权。1971年她在“343名妇女宣言”上签名，承认自己“流过产”，而当时流产在法国是犯法的，70年代她积极投身于法国和世界的女权运动，我们经常看到她出现在各种游行示威的行列中，她把女权思想从理论落实到政治和社会的具体行动。在女性解放问题上，她始终忠于自己的主要命题，认为只有通过工作，女性才能实现自我解放。所有的独立首先都是经济的独立，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黄荭：1967年波伏瓦已经处在荣誉的巅峰。她刚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回忆录的三部巨著《闺中淑女回忆录》、《盛年》和《时势的力量》，还有描写她母亲去世的书《宁静而亡》……

戈贝尔：萨特认为《宁静而亡》是波伏瓦写得最好的书，我本人也很喜欢这本书，死亡是一个萦绕不去的哲学命题。波伏瓦的作品大多是悲剧性的。在回忆录的第三卷，1964年出版的《时势的力量》的最后，她写了著名的一句话：“我受骗了。”有一部分读者很震惊，至少很困惑。她的意思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生都错了，虚度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问她这个问题。她要如何解释她是快乐的，但同时又时刻受到时光的流逝、偶然、衰老、死亡的覬觞？波伏瓦勇敢而坦诚的回答了这些问题。她说她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因

为她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童年梦想，她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美好的人生，那就是在成年实现年少的梦想。”但人之所以会感到怅然若失，那是因为当回顾往昔，总会发现过去的生活并不能任由您握在手里，仔细端详，它已经不再属于您。而未来，小时候未来是无限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无限在慢慢变得具体，最后变成了极其有限的未来，大限将至，谁都会有一种受骗、挫败的感觉，因为黎明的许诺只是黄昏的暮色熹微。

黄荭：波伏瓦当时才五十九岁，在今天看来还属于老当益壮的年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为什么她当时会有这么苍老的感悟呢？

戈贝尔：有一天她跟我提起被“存在的空虚”所侵袭的人生。或许这是一种作品已经写完、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的感觉，她认为五十九岁的自己已经苍老了，不可能再有爱情，不可能再像年轻时候一样可以一个人或几个人一起出去远足露营感觉体力不支，记忆力退化。这是一种心理年龄暗示，或许她已经隐约嗅到了68年5月风暴酝酿的气息，感觉精英知识分子的时代即将落幕的怅惘。不过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依然是她美丽而自信的脸庞，穿着一件素雅的白色有银色条纹的高领毛衣，白色蕾丝花边的袜子，涂着指甲油，手势极富表现力。她是个腼腆的人，说话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难以模仿。她说话有种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的风格，她过去是个教师，她说话的语速很快，思路敏捷而坚定。我一直觉得她很美，黑发碧眼，优雅而亲切。

黄荭：我知道1975年您进入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处工作，之后做了文艺处的负责人，直到1997年退休。22年间，您曾组织过很多研讨会、戏剧节、艺术工作坊，1979年您甚至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举办了第一场关于“亚洲舞蹈”的国际研讨会。是什么事情让您又回到了对波伏瓦和萨特的关注呢？

戈贝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一个流浪女，我喜欢到处跑，当年我应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的工作时，绝对是“恰当的时机、恰当的人选”，我的英语法语都很好，受过很好的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还有我对一切都很好奇，干劲十足。在文艺处工作期间我最热衷的是“现场作业”，后来做了负责人我也经常跑一线，我不喜欢呆在办公室里，我喜欢和人、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不是刻板的文件。1997年退休后我曾经想过安定的生活，半年在法国，半年在意大利，几乎不回加拿大（那里的冬天实在太漫长），享受巴黎的左岸琴声和托斯坎那的冬日艳阳。

后来有两件事情触动了我，一次是2002年，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在多媒体图书馆看到了看到我和萨特、波伏瓦的访谈片了。坦白地说，电影拍完后我就没再去想了，毕竟时隔多年，我怕自己受不了那些过去的画面，故人已去！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面对自己——那个镜头偶尔扫到、挽着如花发髻的年轻女子。

黄荭：您在影片中的发型的确给我和许多法语系的女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有次我还特意写了邮件问您当时做一个这么复杂的发型要花多长时间，您又是怎样保持的。

戈贝尔：是在弗布尔圣奥诺雷区一家著名的发廊弄的，用了很多发胶，发廊是罗丝和玛丽·卡里达姐妹开的。当时给我做发型的是埃蒂娜，她是法国影星卡特琳娜·德娜芙的发型师。

黄荭：您和朗兹曼的采访方式和摄影方式也和今天很不一样。作为采访记者，你们几乎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就算偶尔镜头里出现了，也是一闪而过，或者只是一个背影，这也是为什么我注意到了您的发型。

戈贝尔：我们当时都认为重要的是突出被采访的对象，所以我们选择了“隐形”，这和现在的记者的确很不一样。另外要提到的是，而且因为版权问题，这三部影片一直没有在法国公映，一直到200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展览，《双人像》才首次得以在法国放映。而萨特专访和波伏瓦的专访至今没能在法国公映，在加拿大，萨特专访在几年前被做成了DVD，题目就叫《萨特：未公开的访谈》。

黄荭：另一件事是……

戈贝尔：另一次是几年后，我回了一趟加拿大，住在旅馆里，一天我坐电梯出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一个女人认出我来：“戈贝尔夫人，我在广播里听到您谈论波伏瓦，您的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忽然意识到，是时候了，是时候去见证这对自由情侣的传奇人生，还债的时候到了，我应该把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和忠诚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就像当初他们为我开启了人生一样。于是我决定继续“流浪”，这一次，不再是以官员的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以萨特和波伏瓦的朋友的身份，和全世界的年轻人及知识分子谈文学、谈哲学、谈自由和责任，并按照萨特和波伏瓦生前的愿望，“为读过他们的作品和将要读他们作品的人”播映三部访谈片。

黄荭：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萨特和波伏瓦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戈贝尔：是慷慨，还有忠诚。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现实、改变了生活。他们的思想是先锋的，也是自省的。萨特说：“我的内心不应该有任何局限。作为知识分子，我的责任就是思考，‘没有局限地思考’，哪怕会犯错。”这让我想起了庄子说过的一句话：“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2008年11月，明孝陵散步
2009年3月，修订于陶园